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重温《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

Building Global Partnerships: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 Revisited

吉姆·德雷普，美国空军上校（Col Jim Drape, USAF）

“坐在巴黎地铁里，那气味简直能把你熏倒，大蒜味、汗臭味，还有香水味！”任何一个曾在炎炎夏日坐过巴黎地铁的人，都可能发出这种“抱怨”。本文所引，则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驻扎在法国的美国军人们的牢骚。德国人占领法国四年造成香皂严重短缺，使地铁中的气味更加难闻；当然，拥挤的地铁原本就不是宜人之所。

自从戴高乐总统于 1966 年决定退出北约一体化指挥结构，并把美军赶出驻法国的美军基地以来，美法两国空军之间一直没有任何成规模的互动。许多美国飞行员对法国和法国人的直接感受，不外乎周末从驻德国基地去巴黎或欧洲迪士尼乐园游玩一圈，留下些印象。因为缺乏更多信息来源，美国空军官兵可能无意之间从流行文化、战友调侃、家人聊天中形成了自己对法国的看法和成见，这种印象在不知不觉中弥散，竟构成整个空军的思维定势。虽然关于法国地铁气味的抱怨无伤大雅，但其它一些广泛的成见却反映出我们对法国的深层误解和偏见。在国防部将“建设伙伴关系”确定为其一项核心竞争能力之时，在空军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伙伴关系战略”之时，这些偏见有害无益，阻碍着我空军和 Armée de l’Air（法国空军）建设伙伴关系的努力。在国防部千方百计裁减规模削减开支包括利用伙伴国能力的背景下，伙伴关系建设的意义更加重大。

确定问题：我们当中有仇法派

去年的一段轶事，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性侵犯指控，再次揭示了弥漫于美国的再熟悉不过的仇法情绪，普通美国人在电视、报纸和网站上表达的讨厌法国人的公开言论正是这些情绪的流露。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学家、研究员贾斯汀·瓦伊斯（Justin Vaïsse）列出了构成“仇法派”的四个阵营：国务院和外交界、自由派、保守派和新保守派，以及美籍犹太裔社区。[1] 自不必说，美国军人很可能属于后三者之一；不过如果将军人单列为对法国人抱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负面）观点的第五个阵营，也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讨论视角。作为美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美国军人对法国人的某些行为特别敏感，例如法国在 1966 年做出了他们认为是放弃北约的行动，在 1986 年拒绝外国飞机飞越法国领空轰炸利比亚的卡扎菲老巢，当然，还有最近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兹举一例：空军协会 2011 年 9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年会，邀请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发表主题演讲。此君在这场严肃的演讲中概述了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挑战，还谈到了伊朗和核武器扩散所构成的威胁。他的观点是：构成生存威胁的，不在于核武器本身，而在于拥核者。他指出，美国没有因为英国拥有这种武器而感到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我们也不再忧虑与俄罗斯人的核冲突。此君进一步宣布：我们对法国也不担心，言毕却又面露踌躇之色，于是一句即兴玩笑横空而出（毫不夸张）——嘿嘿，我们对法国人还拿不准——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然而，此玩笑非彼玩笑，置身于坐满了美国空军高官、军官和士官的大厅之中，置身于回响在大厅内的会意的笑声中，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听众——听众里包括法国空军代表——也能感受到我们美国空军对“敌人”的特定看法。也就在这同一个讲台上，我们的空军高级领导人宣讲着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的必要性，赞颂着法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空军。

这不是什么新现象，也不象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戴高乐总统的特立独行及其主导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结构的决定。早在 1945 年，对法国人的讨厌和成见就在战后驻法国的美国大兵中风靡一时，陆军部甚至不得已编了一本名为《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的小册子，发给士兵，作为化解美军和当地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工具。[2]《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采用问答形式，首先列举对法国人的一系列抱怨，随后用常识逐条驳解。按照编书者的说法，这样做并不是要为法国人“辩护”，或者训责讨厌法国人的美国人，而是让普通的美国士兵更充分地了解了他们的东道国。小册子以简单明了的方式，提出了“即便是最善意的人也可能忽视的事实和判断。”[3]

本着同样的精神，本文讨论美国空军许多人对法国人持有的——也可以说一直持有的——三种成见，因为这些抱怨都直接来自 1945 年的那本小册子。如小册子一样，本文无意用言之凿凿的口吻来“说服那些陷入偏见而无可救药的人们，”而只希望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一个重新检视这些成见的机会，因为偏见如果不加遏制，将泛滥成我们看待一个重要盟邦的唯一基础。成见就象流感，动辄传染给他人；因此，一如陆军的这本小册子所言，本文至少希望做到“防止别人染上同样的可悲病毒。”[4] 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来讲，本文希望为空军正在进行的各种努力再

添一把力，推动我们与同为世界最优秀空军的法国空军发展持久伙伴关系，法国空军已在最近打击利比亚的空中作战中展现了强大能力。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看法，标志着这一努力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救过法国人（两次）……他们怎能如此忘恩负义？

《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我们在过去 25 年中两次出兵欧洲拯救法国人……他们为我们做过什么吗？而我们一次又一次救法国人于水火……他们早就忘记了，忘恩负义的家伙。[5]

这些 1945 年就想努力消解的抱怨，至今仍不绝于耳。因特网上反映这类抱怨的笑话信手可拈，比如这个段子："问：哪个英语单词在法语里没有对应词汇？答：感恩。"[6] 时至今日，许多美国人想到法国时，就会联想到美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浴血奋战和在 1944 年 6 月 6 日进攻日那天向着诺曼底海滩冲锋的英勇无畏。以下是一段关于法国人受惠于美国人而需怀感恩的引文，表达了许多美国人，当然包括美国军人在内的感受：

> 法国对于美国，负有一项庄严义务，是荣誉也是感恩，为美国在两场可怕的战争中救其于丧国之殇，为美国在和平时期为其耗费之高昂财资；这项义务要求法国不可做出任何举动……让美国觉得法国忘恩负义，不认美国的巨大牺牲与慷慨。[7]

有趣的是，这番评论虽然出自六十多年前某份报纸的社论，却仍然准确地反映了当今许多美国人的心态。然而，在审视这种认为法国人忘恩负义的观点之前，让我们沿时光隧道追溯另一场决定我们本国生死存亡的冲突。这一年是 1778 年；这场冲突是美国革命战争。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这是因为，简单来说，如果不是法国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拯救了美国，美国在 1944 年对法国的拯救就无从谈起。1778 年 2 月，战争进入两年之后，美国陷入困境，急切寻求法国的帮助。华盛顿将军在向法国的求救信中明确表达了几近绝望的恳求："此时此刻，我们危在旦夕，不是难以决断，而是迫在眉睫……我们的军队就要衣不遮体……我们的医院已经无药可用，我们的伤员正在忍饥挨冻……一句话，我们已经一筹莫展……再不发救，就永无发救之日了。"[8] 最终，法国送来了急需的救援，这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正式结盟。美国陆军的这部袖珍指南这样提醒美国士兵：

> 法国向 13 个州贷出 600 万美元——更**赠与**我们 300 多万美元。
>
> 45,000 名法国人志愿加入了华盛顿的军队——他们乘坐小船，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渡过大西洋。
>
> 华盛顿的军队中没有军事工程专家，是法国工程师给我们设计和建造了防御工事。[9]（粗体强调来自原文）

陷于危困的大陆军队获得解救而走向新生。直到战争的最后，法国的援助一直举足轻重——君不见，1781 年，正是法国海军出手相助，约克镇英军才被迫投降。[10]

短短十年后，法国大革命和法国随后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君主国的战争，使年轻的美国面临"报恩"考验。以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必须援助法国革命，以报答法国以前的援助。[11]

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反驳，称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本国，不可感情用事，而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他指出,法国当年帮助美国，其实也是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12] 果不其然，根据历史文献，当时法国外长夏尔·格拉维埃·韦尔热纳伯爵解释法国的决策时，完全依据国家主义的原则："第一，它会削弱英国的力量，而增加法国的比重。第二，它会给英国贸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时大幅度扩大我国的贸易。第三,它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极有可能夺回英国人在美洲从我们手中抢走的部分领地。"[13]

因此，曾亲历约克镇战役而深切知道法国支援对此役之胜的重要作用的汉密尔顿坚持认为，美国现在也必须照顾自己的利益。最后，华盛顿接受了汉密尔顿而非潘恩和杰斐逊的观点，虽然与法国的正式联盟从来没有解除，他在 1794 年发表了《中立宣言》。此外，七年后，当上总统的杰斐逊本人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尽管他的外交政策一直对法国友好而与英国敌对，但是事关对新奥尔良控制权的争论迫使他威胁与英国结盟和对拿破仑宣战，因为新奥尔良是美国通商的主要通道。[14]

杰斐逊，这位曾经的驻法大使，忘恩负义了吗？他忘记了巴黎的朋友吗？他曾经这样说起自己在巴黎的朋友："我从来没有结识过如此仁慈的人，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友谊是如此热情和忠诚。"[15] 华盛顿，曾与拉斐特侯爵发展出如此亲密的友谊，难道也忘记了美国应对法国所发挥的作用感恩戴德吗？毕竟，在英国投降的当天，华盛顿就说过："我真希望我有机会向国会表达我对格拉斯伯爵及其舰队的殷切感恩之心。"[16]

当时,许多法国人感到自己被"不可信赖"的盟友背叛，这种情绪和当今许多美国人对法国人的感受简直如出一辙。然而汉密尔顿并不认为感恩、善意和慷慨不值得推崇；他只是说，把这些情绪留给个人，而不是政府。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在宣布中立时，只能首先维护本国的利益，因为开国元勋们知道如果纠缠于欧洲事务，就可能断送这个新兴国家的命运。正如《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埃尔布里奇·格里所写："也许只要一项原则，即自我利益，就能说明一切。"[17]

在此历史背景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参与。1940 年 6 月，德国击溃法国军队，法国总理致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出以下请求，一如乔治·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向法国发出的请求："如果您不能在未来数小时内向法国确认美国将很快参战……世界的命运将会改变…… 随后你会看到法国象溺水者一样，向她所努力拯救的自由国土投去最后一眼，从此永远消失。"[18]

自不必说，这种充满悲情的请求，加之美国对法国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出手相助的报恩之心，一定会激起美国采取回报行动，对不对？不尽然。美国继续旁观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参战;再两年后，第一支美国部队才在大西洋北非海岸登陆。

在诺曼底登陆进攻日前夕，年轻的美国兵等待着为祖国而战的危险时刻来临，这样的视死如归需要勇气。但如果是为另一个国家去献身，则可能需要更具说服力的理由。为了帮助军人做好心理准备，陆军部给每人发了一本小指南，提醒他们为什么应该为法国冒生命危险：

你们所参与的盟军进攻行动是具有坚实事实依据的，归纳如下。当历史发生磨难时，我们民主国家并不只是为相互帮忙而战，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当你进入法国后，注意看周围，你会看到纳粹对一个民主国家下手的企图得逞后，是如何地蹂躏这个国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他的计划是首先摧毁法国，然后再攻下英国，这样不用作战就能把美国逼到死角。盟军将从被占领的法国打开缺口，重建往日的自由同盟，在全球摧毁纳粹政权。[19]

一年后，美国士兵抱怨战后法国的生活，陆军部认为有必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提醒他们，为什么美国当初选择介入：

无论是1917年还是1944年，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救法国，也不是为了帮任何国家的忙；我们来欧洲，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受到一个敌对的、充满侵略性的和非常危险的强权的威胁。

在这场战争中，法国于 1940 年 6 月沦陷，我们直到 1944 年 6 月才出兵欧洲。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要通过军事行动来“拯救法国”，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直到德国向我们宣战。我们之所以来欧洲，参与两场战争，是因为与敌人在欧洲作战要比在美国作战更好……。

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建立在这一确凿的事实之上：我们不能容许任何敌对强权存在于大西洋之上。如果我们在大西洋上面临威胁，美国就不会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1917 参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1944 年不得不参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出于常理并出于国家利益，罗斯福总统做出这样的宣示（1941 年 11 月 11 日）：“保卫法国志愿军（自由法国）控制之下的任何领土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20]

因此，就像法国卷入美国革命战争一样，这些引文清楚表明，拯救法国的理由显然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这并不是说，感激美国援法的个人感情不值得尊重，或者根本不存在。相反，任何曾经到过诺曼底或者在法国其它地区旅行过的美国人都可以作证，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法国人知道感恩，对美国人怀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因为美国两次跨越大洋在世界大战中与他们的同胞并肩战斗。然而，正如汉密尔顿在两个世纪前明确指出，这些个人情绪无论多么强烈和正当，都不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在出兵干预利比亚问题上的辩论，就可获得验证，就知道国家领导人到头来必须证明，必须给出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其它国家结盟、支持某一外交政策、或者出兵干预等决策符合美国利益的理由。在讨论美国人对法国人的下一种成见之前，让我们重温奥巴马总统 2011 年 3 月在国防大学的讲话，作为这一部分讨论的结束。总统在讲话中强调了国家利益的至上地位：

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再多等一天，班加西……就可能遭受大屠杀。

放任这种事情发生决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一方面，一些人质疑为什么美国应该干预——即使是有限的干预——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土。

……考虑到干预的成本和风险，我们必须始终以我们的**利益**为标杆衡量行动的必要性。

阻止卡扎菲镇压反对派，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利益**……我深信，如果不对利比亚采取行动，美国将付出远更高昂的代价。[21]（粗体强调为笔者后加）

法国人宁可投降也不战斗

《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法国人没有勇气……他们轻易地逃脱了战争……坐等我们去解放他们。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奋起抵抗？[22]

第二个主要的抱怨，一直存在于美国文化中，那就是法国人是懦夫，不愿挺身而战。美国一部流行卡通系列片就把法国人描画为是“吃奶酪的投降猴子。”[23] 其他有辱人格的引用比比皆是，例如 2005 年，“赛百味”连锁快餐店为“法国名厨”鸡肉三明治所作的宣传广告画了一只身着法国军装的鸡，上面的标题是：法国和鸡，两位一体（英语中用鸡表示胆小鬼——译注）。[24] 此外，在因特网上和深夜电视节目中，这样的讥讽也不绝于眼耳:“法国不帮我们把萨达姆从伊拉克除掉，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毕竟，法国也没有帮我们把德国人赶出法国。”[25]

六十五年中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同样的情绪在 1945 年就已存在，美国大兵当年就这样抱怨：法国根本没有对德国发起一场真正的战斗。美国陆军部直截了当地批评这项牢骚：

> 没有人——更不会有任何法国人自己——试图否认法国在 1940 年遭受的惨重失败和屈辱。法军领导无方，战略严重不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没有发起“真正的战斗”。
>
> 持续六个星期的法国之战，从 1940 年 5 月 10 日坚持到 6 月 22 日，法国失败了，仅军人就有 260,000 人负伤，108,000 人阵亡。六个星期中高达 368,000 人的伤亡，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也无法一带而过。[26]

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计有 1,115,000 法国成人和儿童或死亡、或受伤、或在集中营里受难、或作为人质而死——而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轻易地逃脱了战争”。

此外，像战后驻扎在法国的美国士兵一样，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不甚了解，勇敢的法国公民在德军占领期间也曾坚持斗争。美国陆军部将法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气展现给其部队：

- 他们破坏战时工厂生产，销毁零件，破坏机器，阻挠生产，更改蓝图。
- 他们炸毁电厂、仓库和输电线路，破坏列车，毁坏桥梁，损坏车头。
- 他们组织武装团体对付德国警察、盖世太保和维希傀儡政权的伪军，处死与德国合作的法奸。
- 他们成为设在伦敦的“联盟远征军最高总部”间谍大军，每天向最高总部转交多达 300 份关于德国部队调动、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性质与动向的报告。
- 他们为伦敦获取德国新武器和炸药的样本。
- 他们精心组织出一条“地下铁路”，将被击落的美英飞行员运送到英国……在 1940 年到 1944 年间，德国人为了阻止法国人的破坏和对盟军的支援，平均每两小时射杀一名法国人。[27]

这些例子一桩桩都令人沉痛，但我们不需要一直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寻找法国人投身作战的实例。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法

国干预了非洲的许多冲突，并且在近年组成的几乎每一个联盟中都勇敢地与美国人一起并肩作战，其中包括第一次海湾战争、波黑、科索沃和阿富汗——只有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然而，尽管讥笑泛滥，法国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与懦弱无关，而是源于他们对所掌握的情报来源的信心，他们根据情报得出结论：萨达姆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他们推动进一步武器核查，要寻求出真相；他们认为萨达姆并不象美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构成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28]

目前，法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占第四位，法国军人在冲突中的阵亡人数也相应占第四位，已阵亡 78 人。[29] 法国是在其领土以外建立空军基地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些基地都部署在战略热点，除阿富汗之外，还有如吉布提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阿联酋与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伊朗隔海相望。另外，或许对很多人来说颇为惊奇，法国空军曾经果敢地领导了盟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1973 号决议的行动，该决议呼吁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

除了在国家层面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可以回顾最近的两项事件，这两项事件凸显了美法两国军人在阿富汗当前冲突中所表现的英勇。近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将军把“飞行卓越十字勋章”授予在佐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第 41 救援中队的一位年轻法国少校，以表彰他的勇敢。在派驻阿富汗期间，作为四机飞行特别行动的一部分，这名少校勇敢地起飞，执行夜间救援英国伤员任务，由于这名英国军人的受伤，使 160 名英军士兵身处险境。他冒着火箭弹的攻击，不仅成功地救出那名伤兵，还营救了另一名士兵，确保地面部队得以完成其任务。

在此前三天，在环境严峻的卡皮萨前沿作战基地，阿富汗东部法国地面部队指挥官法国准将埃马纽尔·马林授予三名美国飞行员“法国国防奖章”，以表彰他们在一次夜间直升机救援中救回两名法国飞行员的英雄行为。这两名法国飞行员驾驶的“瞪羚”攻击直升机因恶劣气候坠毁。美国空军派出飞机空投救援小组搜寻失事飞行员，他们发现那个法国飞行员挥舞着闪光灯，却无法移动双腿。救援人员随后也找到了副飞行员，他仍被绑在自己的座位上，但座位已脱落下滑到了直升机后面，这位曾经参加过克罗地亚、科索沃和象牙海岸等冲突的 37 岁的老兵当时正勇敢地挣扎着呼吸。救援人员在他脖子上切开一个小口，然后插入呼吸管。直升机将两名负伤军人转送到巴格拉姆机场的医院。飞行员最终脱离危险，有望重新站立起来；但副飞行员不幸去世，抛下生活在法国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这些动人的事迹表明，法国与美国的其它盟国在阿富汗并肩英勇作战，必要的时候，如同那位法国副飞行员一样，他们也不惜为国捐躯。在上述故事中，那三名因勇敢救援而获得法国国防奖章的美国军人，不会从那些讥讽法国人怯懦的笑话中体会到任何幽默。同样，被作为交流军官在美国空军服务并受到施瓦茨将军嘉奖的那位年轻法国少校（那场行动的指挥官）营救出来的英军士兵们，也不会欣赏这些笑话。我们并看到，施瓦茨将军和法国空军参谋长让 - 保罗·帕罗梅若斯将军在拉斐特飞行小队纪念馆前面并肩而立，这里是最初一批 66 名美国飞行员和他们各自中队的法国中队长的长眠之地。[30] 两位空军参谋长还为当天在阿富汗的一次伏击中阵亡的 5 名法国军人共同默哀——这一时刻尖锐地提醒着我们：凡为军人，不忘天职，

无论着什么军服佩什么肩章。懦弱、投降、临阵逃跑之类的抱怨或讥笑在这里没有听众。在我们讨论以下第三种成见的时候，该把这些抱怨和讥笑统统收起来。

我们不能信赖法国人……他们太特立独行

《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我们不能信赖这些法国人……法国人太特立独行。[31]

大多数美国飞行员对下面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个中东国家的独裁者无视西方，挑衅性地梦想一统整个阿拉伯世界。西方国家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构成威胁，但有一个国家呼吁允许更多的时间，寻找外交解决危机的办法；而另一个国家，虽在持续进行外交努力，却认为更多外交实属徒劳，便建立起一个战争联盟。最后，这个国家在没有得到另一个国家的支持下毅然开战，带着愤恨，带着被这个拒绝提供支持的不可靠盟友所背叛的感觉。

1945 年，驻法国的美国士兵就抱怨说，美国不能信赖法国。直到今天，许多美国民众，包括许多美国飞行员，还抱着基本相同的情绪，特别是法国选择了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以后。作为回应，众议院将餐厅的“法国炸薯条”改名为“自由炸薯条”；许多议员呼吁抵制法国产品，让人联想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反应。当时戴高乐总统抨击国际货币秩序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认为这等于给予美元特权地位。美国企业对戴高乐的反应是威胁抵制从法国进口的产品，纽约的一家酒吧老板甚至在电视节目上“清理”他的酒窖，将一瓶又一瓶的波尔多葡萄酒倒进下水道。[32]

这些相同的情绪在 2003 年后期已经存在，《纽约时报》的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当时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与法国的战争”的文章。文章这样开始：“我们美国人该做出了断了：法国不仅是令我们厌烦的盟友，不仅是嫉妒我们的对手；法国正在成为我们的敌人。”[33] 无独有偶，约翰·J·米勒和马克·默莱斯基（John J. Miller and Mark Molesky）次年出版了一本书，两位作者在书中反对一直流行的法国是美国最悠久盟友的历史观，毫不掩饰地宣称：法国是美国最悠久的敌人。[34]

与此同时，在 2004 年竞选总统期间，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与法国走得太近。[35] 在 2003 年底，著名电视主持人汤姆·布罗考问克里：“法国人怎么样？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克里回应：“法国人就是法国人。”布罗考对这句“意味深长”的声明继续穷追不舍，克里又回答说：“这么说吧，相信我……我有我的意思，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36]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克里作为一名越战老兵，曾在某处读过陆军部 1945 年对法国人不可信赖的抱怨的回应：“这取决于你对‘信赖’的定义。如果你希望法国人的反应像美国人那样，你会失望的。他们不是美国人；他们是法国人”。[37] 或者，它也许只是意味着法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按其自身利益行事。而美国也是如此。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不能信赖法国？这是否也意味着法国人不能信赖美国？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的场景。大多数读者自会清晰地记得导致第二次出兵伊拉克的辩论，但美国人已经不太熟悉 1956 年

苏伊士危机前后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可能会将法国，而不是美国，视为被“不可信赖”盟友反对的“受害者”。当年的美国赞成以外交手段解决，而反对以武力对付中东独裁者。苏伊士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使出各种手段，破坏法国和英国强行收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努力。其时，埃及总统纳赛尔已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短暂的冲突以英国和法国饱受屈辱结束，两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也因此被削弱。有据为证，当时美国驻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就警告华盛顿说：“反美情绪如同一场怨恨的洪水席卷法国。”他更具体地指出了这种“深深的感情伤害”——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务中对其主要盟国核心利益表现得“无情冷漠”，随时准备“无端地羞辱他们”。[38] 法国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多达一半的法国人对美国“不信任”或者“信任不多”。[39] 自这个事件之后，英国人的认定是，今后决不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参加战争；而法国人的结论是，他们不能再信赖美国。对于两年后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而言，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烙印性事件，肯定影响了他后来在 1966 年做出的决定——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结构。当然，如同本文引言中所提到，他的行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正是不能信赖法国的佐证。

在抱怨“不可信赖”时，我们不要忘记第一部分讨论的问题——所有国家都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即使是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华盛顿也从来没有忽视这一事实。他担心美国打败英国后，反而让法国乘机夺回魁北克。华盛顿“真心实意地怀着对法国人的特别好感”，但同时恪守“一则建立在人类普遍经验之上的信条，对任何国家的信任，只能以本国自身利益为界。”[40] 在更近的局势背景下，兰德公司经济师和防务专家罗伯特·A·莱文（Robert A. Levine）的观察恰如其分：“美国和法国的确有着不同的利益。立足于这些利益，美国将继续充当单边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她有此能力。”[41] 而法国将继续,如克里参议员所言,像法国人那样行事。

关于不可信赖和特立独行的抱怨早在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之前就存在，一直延续到此后五十年。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法美关系一直沿循着类似的周期——每当国家执政机构发生变动后，法美两国间总会靠近一些，随后又不可避免地因某些事件而分开些。[42] 对这样的离离合合，我们不可从信赖的角度来理解，而只能理解为两个主权国家各据自身利益行事，它并不意味着哪个国家“不可信赖”。

米勒和默莱斯基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了过去三百年间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碰撞，这种碰撞从美国宣布从英国独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即从法国与印第安人多次战争中对美国殖民者的屠杀就已经开始。不过且慢，还是把这本书读完，读到最后第二页，我们才能看到并不令人满意的结论——作者在这部洋洋 250 页的反法著作的最后，提出了未来意义的问题。一方面，作者断定：“法国是不是美国的盟友可能根本不重要……因为美国乃世界头号强国，而法国已沦为往往引起些不愉快的小挑事者。”[43] 另一方面，他们又得出结论：“未来无疑将出现各种新的挑战，其中包括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有鉴于此，他们写道：让法国参与到美国的布局中还是有帮助的，但是“考虑到法国人总是通过扭曲的棱镜来观察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这样做可能很难。”他们在书的结尾问道:“简而言之，法国人还会继续是法国人吗？”换言之，他们是否会继续保持“对自己国家

利益的短视看法？”他们是否会意识到“二十一世纪需要一种全然不同的眼光？”[44]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读一读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发生两天后《世界报》的社论，社论作者用标题大胆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世界报》是法国最大的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后被大量引用。许多美国人，或许包括米勒和默莱斯基这样的作家，都期待着此话成真，经历了三百年的艰难交往以后，也许法国人终于开窍了。其实也不尽然。这篇社论不仅仅是面对悲剧性袭击事件的情感流露，它宣称恐怖袭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二十年前分隔东西方的柏林墙倒塌时所发出的欢呼已经渐渐沉寂，新时代再难听到这样的欢呼。社论勇敢地表示：即使我们之间有种种分歧，在人类自由这个最根本的原则上，法国永远与美国并肩站在一起。在当前更处处躲藏着恐怖分子的新斗争中，西方世界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团结。如此，“我们都是美国人”。[45]

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奢侈不起，不可能撇开那些我们看不惯并视为“小挑事者”的国家，或者将他们标为敌人。最近发布的国防战略强调指出，美国必须与其欧洲盟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46] 是的，我们需要法国。通过专业军事教育，美国飞行员已经熟知中国古代的孙子，这位智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后 9-11 这个新时代，财政的实际状况和不同性质的威胁使全球伙伴关系成为必需，但有时了解我们的盟友更重要，甚至更困难。正如空军部长唐利和参谋长施瓦茨将军在《2011 年美国空军全球伙伴战略》中所言：

> 全球经济危机、暴力极端主义、不断变化的地区力量平衡，以及先进技术扩散等各方面的影响，将构成未来安全环境的特征，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挑战与要务。以此为指导，我们正在加强开发可利用资源，以及与国际伙伴的关系，同时建立联盟，以应对当前和新兴的全球战略挑战。成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可优化联盟各部队之间的互通、整合和相互依存，同时也为伙伴国家提供依靠自身优势解决国家安全挑战的能力。[47]

正如法国《世界报》社论指出，法国和美国都意识到，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民主价值观，需要一种有活力的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个新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超越本身的成见，建设与法国强大和持久的伙伴关系，无论法国人看上去是多么不可信赖、多么特立独行或者桀骜不驯。[48]

结语

本文引言部分已经表示，本文无意对一个历来被我们视作特立独行的、不可信赖的、忘恩负义的，甚至是懦弱的盟国提供决断性的辩护。本文只想就此提供一个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法国人可信赖吗？“法国人就是法国人。”此言有其含义。我们面对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法国人如何看世界。法国据本国利益行事处世，一如美国的行事处世。虽然就何为“关键”利益见仁见智，但是在《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问世后的六十五年里，法国和美国在许多重大利益上总是坚定地彼此支持。

总之，虽然尚未编入空军作战准则，但是空军已经采纳了国防部联合能力领域建设伙伴关系的概念，其定义为：“这种能力是指通过开发与提供信息以及开展活动来影响他们的观念、意愿、行为和能力，营造与合作伙伴……领导人、军队和相关群体互动环

境。”[49] 这段定义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本文建议，或许建设伙伴关系和“营造互动环境”的第一步不在于影响别人的观念，而是在于挑战自己的观念——不在于查找别人的问题，而是以历史和常识的透镜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成见。常言说：千里之行始于自家。作为空军，我们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的努力也必须从自家做起。在财政困顿的严峻时期，这些努力可以从一种简单的、技术含量低而成本效益高的工具——镜子——开始。♣

注释：

1. Justin Vaïsse, “Etats-Unis: Le Regain Francophobe”[美国反法情绪重新抬头],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97 (Fall 2002), http://www.politiqueinternationale.com/revue/read2.php?id_revue=12&id=228&content=texte.
2.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s.v.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 http://en.wikipedia.org/wiki/112_Gripes_About_the_French; and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 Army Department, 1945, http://www.e-rcps.com/gripes/.
3.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 “Foreword”[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前言篇], http://www.e-rcps.com/gripes/forward.html.
4. 同上。
5.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 nos. 1, 2, and 6, “The French and Us”[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 1、#2、#6：法国人与我们].
6. “Strategy Page's Military Jokes and Military Humor”[战略之页的军事笑话和军事幽默], http://www.strategypage.com/humor/articles/military_humor_complete_list_of_french_jokes.asp.
7. Richard F.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引诱法国人：美国化的困境],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63.
8. 见注释 5，#6。
9. 见注释 5，#6。
10. “French Alliance, French Assistance, and European Diplomacy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8-1782”[美国革命战争期间的法国联盟、法国援助，及欧洲外交，1778-1782],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776-1783/FrenchAlliance.
11. Encyclopedia of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s.v. “Realism and Idealism—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建国初期], http://www.americanforeignrelations.com/O-W/Realism-and-Idealism-The-early-national-period.html.
12. 同上。
13. John J. Miller and Mark Molesky, Our Oldest Enemy: A History of America's Disastrous Relationship with France [我们的宿敌：美国与法国的灾难关系史], (New York: Doubleday, 2004), 40.
14. “The XYZ Affair and the Quasi-War with France, 1798-1800”[与法国扯不清的关系及准战争，1798-180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784-1800/XYZ.
15. “Facts and Figures”[事实与数字], understandfrance.org, 10 January 2012, http://www.understandfrance.org/Paris/Documents.html#ancre660412.
16. William Hughes, “France Bashers Ignorant of American History”[抨击法国者对美国历史无知], 2002, http://www.artbabyart.com/bill_hughes/francebashers.html.
17. 见注释 13，第 44 页。
18. 见注释 13，第 172 页。
19. Pocket Guide to France [袖珍法国指南], (United States: Army Service Forc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1944), 5-6, http://www.archive.org/download/PocketGuideToFrance/France2.pdf.

20. 见注释 5，#1。

21. “The Full Text of the NDU Libya Speech”[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大学关于利比亚的讲话全文], National Review Online, 28 March 2011,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263265/full-text-ndu-libya-speech-nro-staff.

22.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 no. 76,“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s”; no. 104,“French Collaboration”; and no. 106,“They Got Off Pretty Easy in This War”[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76：法国人与德国人；#104：法国的合作；#106：他们轻易摆脱了战争].

23.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s.v.“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吃奶酪的投降猴子],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ese-eating_surrender_monkeys.

24. “ 'France and Chicken, Somehow It Just Goes Together'—Subway”[法国和鸡，两位一体——赛百味], Miquelon.org—the Fighting French, 11 August 2005, http://www.miquelon.org/2005/08/11/france-and-chicken-somehow-it-just-goes-together%E2%80%9D-subway/.

25. 见注释 13，第 4 页。

26. 见注释 22，#76。

27. 见注释 22，#104。

28. Neil Mackay,“No Weapons in Iraq? We'll Find Them in Iran”[伊拉克无核武？我们将在伊朗找到], Sunday Herald, 1 June 2003, http://archive.truthout.org/article/no-weapons-iraq-well-find-them-iran.

29.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s.v.“Coalition Casualties in Afghanistan”[联军在阿富汗的伤亡],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alition_casualties_in_Afghanistan.

30. 参看“Le Memorial”, Fondation du Memorial de l'Escadrille La Fayette [拉斐特飞行小队纪念基金会网站“纪念”], http://rdisa.pagesperso-orange.fr/html/Frames/la%20fayette.html.

31. 112 Gripes about the French, no. 7“The French and Us”and no. 22,“The French”[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7：法国人与我们；#22：法国人].

32. 见注释 7，第 173 页。

33. Thomas L. Friedman,“Our War with France”[我们与法国的战争], New York Times, 18 September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9/18/opinion/our-war-with-france.html.

34. 见注释 13，第 7 页。

35. Roger Cohen,“Globalist: The Republicans' Barb; John Kerry 'Looks French' ”[全球人：共和党人尖刻指责克里“一副法国人嘴脸”], New York Times, 3 April 2004, http://www.nytimes.com/2004/04/03/news/03iht-globalist_ed3_.html.

36. 见注释 13，第 254 页。

37. 见注释 33，#7。

38. 见注释 7，第 24 页。

39. 见注释 7，第 24 页。

40. 见注释 13，第 45-46 页。

41. Robert A. Levine,“Yes, France, America Will Keep Acting Unilaterally”[是的，法国，美国将继续单边行动],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8 February 2002.

42. Fr é d é ric Bozo and Guillaume Parmentier,“La France et les Etats-unis entre é ch é ances int é rieures et tensions internationaux: Une r é conciliation limit é e?”[内部压力和国际紧张中的法美关系：有限的和解 ?], AFRI: Annuaire Fran-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8 (2007): 555, http://www.afri-ct.org/IMG/pdf/37_Bozo_et_Parmentier.pdf.

43. 见注释 13，第 258 页。

44. 见注释 13，第 259 页。

45. 见注释 13，第 1 页。

46.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 世纪国防的优先排序],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2), 3,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47.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2011 US Air Force Global Partnership Strategy [2011 年美国空军全球伙伴战略],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2011), [1], https://newafpims.afnews.af.mil/shared/media/document/AFD-111228-013.pdf.

48. 见注释 42，第 549 页。

49. Jefferson P. Marquis et al., Adding Value to Air Force Management through Building Partnerships Assessment [建设伙伴关系评估系统，改善空军管理质量],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6,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technical_reports/2010/RAND_TR907.pdf.

吉姆·德雷普，美国空军上校（Col Jim Drape, USAF），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现作为派赴法国空军参谋部的交换军官，服务于历史悠久的巴黎军事学院空天战略研究中心战略事务部。他毕业于法兰西战争学院，因撰写一篇描述他自己对法国人的偏见如何转变的文章而获得劳瑞尔将军（General Laurier）奖。赴法国之前他指挥驻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第 734 空中机动中队，并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工作三年，服务于众议院空军联络办公室，还在内华达州众议员吉姆·吉本斯（Cong. Jim Gibbons of Nevada）办公室担任立法研究员。上校是高级飞行员，拥有超过 2,500 小时飞行经验，他也担任过第 15 编号空军司令官的随从副官，及美国空军军官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中美关系过去 40 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中美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2012 年 5 月 4 日（摘自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video/2012-05/06/c_131571116.htm）

China-U.S. relations have seen progress after experiencing many ups and down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partners rather than competitors.

—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Liang Guanglie, May 4, 2012 (From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hour/20120505/105415.shtml)